

*Literary Doctrine in China and Soviet Influence 1956—1960.* By D. W. Fokkema. (London: Mouton & Co., Paris: The Hague, 1965. pp. xiii+295.)

佛克馬博士在荷蘭萊頓大學 (Leyden) 獲得最高學位以後，加入外交部東亞司服務，於一九六二年間，曾在荷文報刊上發表過一篇關於中共(1960)第三屆作家與藝術家大會的報導文章，內容不只介紹中國共產政黨嘗試在文學上所立的新方針，反映着社會和政治上的重大含義；而且對於新文化現象有精到的分析。不久，佛氏得Harkness獎學金留學美國加州大學，利用Berkeley中國文化中心收藏極為豐富的當代文獻資料，以一年的勤奮功力，寫成這書。

佛氏在自序中，很詳細敘述其撰寫此書之主要目的。他尋求中國大陸在「百花齊放」期間及以後一九五六至一九六〇年間「文學」一詞的真義。雖然這段時間很短暫，然而把當時中國文學理論的歷史發展記述下來，似乎也頗值得。每當大陸方面傳來有關文學觀念發生動搖消息時，海外讀者不當假設以為整個文學體系也發生動搖。本書討論範圍所涉及的在此段議論紛紜期間的文學及文藝批評，甚至正統派的文藝觀點，也相當模糊的。

正統派觀點可從毛澤東及周揚的作品理論中見之；而中國文藝理論中「文學」一詞之定義，皆以此為依歸。文藝批評家對文學的要求，也有探討的必要。若從社會學角度說，中國這樣一個國家，較為重要的，就是政治家的要求，得須首先懷抱着這種態度，才能領略文學在大陸的真義，風花雪月那套在思想方面的地位，以及文學在政治及社會生活上所扮演的腳色。

經作者過目的文獻，包括有文藝批評，及普通有關文學的目標、功用、形式及取材的作品。作者利用其在萊頓大學所接受過的舊式中文誦讀經驗，來直接閱讀那些創作性作品，兼為文藝批評及文藝理論之實踐應用。中國古典文學之改編，及蘇俄西方文學作品的翻譯，其選擇標準，對於研讀中國共產主義者所主張的一套文藝理論，有極大的啓示。

本書另一目的，是把蘇維埃在文藝方面對中國的影響作一估計。中國文藝觀念與蘇俄比較，有很多地方相同，甚至有些中國文藝理論，源出蘇維埃。因而，對後者的認識不足，前者便很難解釋。這裏，首先要分辨「影響」及「平行發展」的不同。平行發展

及由於中國跟蘇聯的政治因素相同所形成，兩者在社會組織方面有很多類似，均為極權國家，共產黨在彼此社會中，皆佔特殊地位，同時兩者的文學，主要是受着共產主義理想牽制。基此原因，便不能肯定蘇俄文學及文藝理論，均在中國發生影響；除非中國書刊有提出蘇俄文藝作品及理論，或找到蘇俄書籍論文的中譯本，或有足夠證明顯示某些中俄作者有私人之往還。

檢討下一九六一年時期，中國所受蘇俄文藝影響，對理論歷史方面的研究甚為有趣。一九六一年，周恩來在蘇聯第二十二屆世界共產黨大會中，公開指責赫魯曉夫欠缺「嚴肅馬克思、列寧態度」；中蘇共黨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解釋上之不協和，首次為世人所知。若與純粹政治及理論的黨派作品比較，文藝所受之影響不應為人低估。自一九五六至一九六〇年期間，為中國接受之蘇俄文藝作品自成爲一類；而同期蘇俄所出版之文物中，部份不為中國歡迎。

在此期間，中國文藝批評發展燦爛，一些「修正主義者」的理論，迫使其他作家創立新的正統學說，後者均脫胎於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公開發表的意見。後來，正統派終於成功地使其他異說保持緘默，正如原定於一九五七年秋，後改於一九六〇年七八月間舉行之第三屆作家大會所發表之報告中清楚地所列出的一樣。

佛氏對工作認真的態度，不禁令人佩服。本書中每一段文獻，都經過他有條不紊的審辨，對於任何可能爲人忽略的線索，尋根究底，詳細地把解答分析出來；而表示意見及批評時，佛氏更常有發人深省的妙論。在同類書中，本書首開先河；對共產黨的中國文化生命開始十年前之探討，不失爲市面上最完備的典籍。文中有關資料，均直接採自中國大陸刊物，經作者細心審閱及選擇而成。同時，作者在編排資料工作中，詳徵博引，與影響中國的蘇維埃文學理想做比較。

陳世驥教授在此書序言中說過：『中國共產黨在文藝的偉大航程中，彷彿面對錦綉前程，船員對正確航線如在五里霧中，只有對舵手懷着絕對的信任，因為惟有他掌有一個萬靈的羅盤。航程不能間斷，即使目標或未可達而徒勞無功。舵手每次着令改變航向，均可證明其對全船性命和財物的不可置疑的權力。假如他有能耐，經過浩漫長天和遙遠航行，仍未翻沉，縱使目標仍未達，同船者也許明瞭其中乖巧，對岸的對真相也許不會察覺，舵手本身或惘無所知。』

『看過佛博士這本書，有如親歷一次波濤洶湧的航程，他把每一幕經歷，可靠和逼真的紀錄下來，經常著重最重要的和不尋常的，而又並未爲人所知的事。他所得的結論

是精粹的。作者討論各問題至為詳盡，讀者若仍有不明白之處，大概是由於不大慣熟文中有些名詞或術語的緣故，詳讀本書後，自能熟習。我建議最好早些熟習，因為它們將會在廿世紀中國文化上，佔上非常重要一頁，而佛博士這本名著，實為一代巨著，我們生存當代，定能領略它的學術上的價值。』

本書附錄的「中英人名對照表」及「中文名詞翻譯簡表」，對於非中國人士，極為有用；著者間或在英譯之外，加注蘇聯譯文，蘇聯讀者對此當更表歡迎了。

李 棧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the Century of Discovery.* By Donald F. Lach.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Vol. I, Bk. 1, pp. xxviii+492; Bk. 2, pp. xii+965. Ills.; Maps; Bibliographies: pp. 837-912.)

美國芝加哥大學拉克教授的巨著亞洲與近代歐洲之形成，第一卷發現時代（*The Century of Discovery*），第一、二冊，一九六五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印行。其第三編第六、七、八、九各章，於一九六八年分別抽印為仙禽叢書（*Phoenix Books*）紙面普及本，依次題名為十六世紀歐洲所見之印度、東南亞、日本、與中國。本卷全文共三編，十章。第一編兩章，敘古代、中世、與文藝復興時代對亞洲的交通與認識。第二編三章，敘香料貿易、印刷書籍及東方知識的傳播、與基督教傳教士的東來。第三編五章，除上述的第六、七、八、九等章外，第十章為尾言，概述十六世紀歐洲所見的亞洲之綜合的形象。由此可見本卷第三編實為全卷的主體所在，而第一、二兩編乃為第三編提供背景的知識。本書的著作，據拉克教授的計劃，尚餘五卷，敘事至一八〇〇年止。今第一卷已近千頁，今後更將以五卷的篇幅，述十六和十七兩世紀的歐亞關係。其著作規模的恢宏與取材的廣博，於近出的多種同類的著作中，罕有其匹。本卷卷末附共同書目二十一頁，分章書目四十八頁，精審美富；而於本文與腳注中，復多對於個別史料的批評與討論。本卷未多引用中文史料與著作，惟曾兩引方豪教授論文，一佐證日本藤田豐八氏所主張的“Liampo”為雙嶼之說（頁737），一記近世初期傳入西班牙與葡萄牙的中國文獻（頁779）。分章書目中列有陳詩啓撰明代官手工業的研究，「官手工業」用羅馬字拼音作 kuan-shou kung-yeh，似當以作 kuan shou-kung-yeh 為較宜。然本卷於中國學者的